

国运2021：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及世界

2020,大疫之年,艰难之年。

新冠疫情给各国经济数据砸了一个大坑,给很多企业、家庭及个人的收入也砸了一个大坑。新冠疫情及救市行动加剧了世界的分化与撕裂:穷人在通缩,富人在通胀。

2021年,世界进入后疫情时代。各国头号政治任务为加紧注射新冠疫苗,打破一年来的“与世隔绝”。如此,人们将逐渐回到那熟悉的生活状态。然而,在回归熟悉与稳定的路上,大疫之年显现的冲突依然延续。

01、病毒、繁荣与崩溃

新冠疫情给我们最大的教训是,人类应该对微观世界保持足够的敬畏。

这个病毒,几乎一夜之间让全球人类回到了“原始状态”。在此之前,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事会发生在科技发达、经济繁荣的全球化时代。

堆积如山的股票资产,披星戴月的印钞机,技术先进的辉瑞制药,反应迅速的公共卫生系统,高效输送的全球化供应链,大腹便便的国际治理机构,竟然被一个不知哪儿蹦出来的小病毒暴揍。被暴揍时,各国还忙于国际扔锅比赛。外星人看到,不知会怎么笑话我们。

如今的我们仿佛身处在一个“薛定谔的猫”的世界,牛顿的世界很完美,但尼尔斯·玻尔的世界早已崩溃。很多时候,我们无法分辨这个世界到底是繁荣还是落后,文明还是罪恶。站在深圳湾,你看到的是买房如白菜的世界;站在甘孜,你看到的是丁真的世界。这就是宏观与微观背离产生的违和感。

现代文明是由一个个小人物、微选择组成的系统工程。任何一个微观出问题,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扭曲、失衡、停滞,最终崩溃。

例如交通拥堵。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是什么?是道路供给不足。道路供给为何不足?跟城市土地产权直接相关。在土地个人产权制度的城市中,道路由市场主导,形成一个个网络密布的微循环,像纽约的街区。如果是相反的土地制度,容易形成一个个占据超级面积的大社区、大宅门,减少了道路供给,阻断了车辆通行。像我所在的社区,将东西向车辆赶到深南和北环,导致这两条主干道堵塞。土地产权影响到了整个城市的交通系统,而堵塞的交通系统降低了城市经济效率。

病毒,是人类大规模协作的主要风险之一。对抗这种风险的古老办法是空间隔离,上古与农耕时代,村落之间“老死不相往来”。

进入工业时代,不同国家、种族、肤色的人参与到自由市场的大规模协作中,从而大大增加了病毒传播的风险。不过,自由市场又是抵抗病毒的良药——医疗技术、商品制造及自由交易。

所以,近代社会以来,人类的医疗技术与死神(病毒),在自由市场上展开一场没有终点的边际赛跑。如果医疗技术“打盹”,人类将被病毒征服。

什么情况下医疗技术可能“打盹”?

医疗市场的任何一个微观被干预都可能导致医疗技术“打盹”。比如,医疗商品进口被限制,医疗企业无法进口有效的技术、药品及疫苗,降低了技术革新,错失了防御时机。又如,医疗企业及医疗保险被低效的公共部门把持,技术长期停滞不前。再如,信息无法自由流通,价格机制失灵,无法告知医疗企业增加防疫产品的供应,也无法告知民众提前防疫。

病毒是一种外部性风险,病毒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外部性风险。光靠自由市场和经济全球化是远远不够的,对抗外部性还需要公共用品,即公共卫生系统及国际公共卫生机构。如果公共卫生系统迟钝、公共卫生资源不足、医疗保障不健全以及国际公共卫生机构无能,都会引发灾难性后果。

在人类现代文明的宏观体系中,医疗技术进口限制、医疗企业产权改革、信息阻隔以及公共卫生系统落后是微不足道的“细节”。但是,这些不起眼的“细节”,足以击溃宏观大厦上一切人类文明及生命。因为病毒不会“打盹”。

新冠疫情提醒我们,当今的人类正在遭遇各种微观扭曲的惩罚。

当今人类面临的另一大威胁是人口危

机。2020年中国经济学家呼吁放开生育政策,以应对低生育及老龄化问题。但多数思维还停留在宏观上的“上帝视角”和“父爱主义”——人口多则限制生育,人口少则鼓励生育,极少关注到人口危机背后的微观本质——个人生育行为的边际扭曲。

个人生育行为为何扭曲?

在避孕套未普及之前,人类无法控制生育行为,个人生育行为难以纳入经济函数中去考察。不可控的生育产生了外部性,如杀婴、瘟疫、饥荒与战争。约翰·穆勒不得不折中方式处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——技术增长大于人口增长时,不限制生育,技术增长低于人口增长时,限制生育。

避孕套普及之后,生育行为完全演变为个人的经济行为,直接改变了人类的经济增长方式。生育几个小孩,如何养育与教育,取决于个人或家庭的生育边际效用。通常,生育数量越多,边际效用越低。随着经济的发展及收入的增加,家庭更倾向于少生优生,从教育中获取更高的效用。这样经济增长就从数量型增长向效率型增长转变,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升级。所谓一国的经济转型、技术迭代,落实到微观上就是个人生育行为的选择——生育边际效用的提升。

但是,现在的问题是个人生育行为被限制,或被扭曲了。而个人生育行为的扭曲往往是由其它微观系统引起的。比如,土地产权。土地产权被垄断,导致房地产价格持续高涨,削弱了城市家庭的真实收入,增加了生育成本,降低了生育效用。这导致人口数量和质量双双下降,造成“未富先老”的老龄化危机。土地产权,这个微观“细节”,影响到个人生育行为,进而威胁到技术革新、经济效率、人类繁衍及整个文明系统。

当今世界,货币供给是影响文明进程的另一个微观扭曲。经济学中的货币理论基本上都支持央行干预主义,但这与经济学原理是相悖的。货币干预是一切金融危机的源头,是社会矛盾的制造者,已经威胁到人类宏观生存。

医疗技术、进口政策、信息阻隔、个人生育、土地产权、货币发行、数据垄断……每一个微观不畅,都会造成整个系统的低效、停滞乃至崩溃。这些梗阻阻碍资源流通,扭曲市场价格,制造了一个个金融资产的“堰塞湖”,一个个技术创新的“减震带”,形成两个割裂的“平行世界”:穷人通缩,富人通胀;实体经济通缩,资产通胀;微观通缩,宏观通胀。

2020年大疫之下的刺激政策加剧了世界的分化。美股先暴跌后反弹,涨幅前20%的股票贡献了纳斯达克指数97%的涨幅;深圳楼市逆势大涨。与资产价格膨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不少人失去了工作与收入。前有梗阻,后有刺激,河里的泡沫越来越刚性,岸上却越来越干涸。

这是一个令薛定谔费解的世界。宏观世界的繁荣充满迷惑性,从而忽略了微观世界的脆弱。“不惜一切代价”的危险是不惜一切代价地摧毁微观生存的根基。病毒危机、人口危机、资产泡沫危机正在告诉我们,微观梗阻正在癌变,并向整个系统扩散。

2021年,进入后疫情时代。有效疫苗的出现,意味着人类在跟死神的边缘赛跑上领先了半个身位。需要避免的是,看台上的啦啦队将其异化为大中央主义和大政府主义的胜利。它只能说明在微观癌症尚未扩散并击垮文明系统之前,自由市场及经济全球化还有那么一些效率。

过去,我们将一些领域市场化,一些领域非市场化,使用权可以交易,所有权不能交易。如今,这种张五常式改革的边际递减了,各种结构性后遗症爆发。

所谓“微观胜宏观,制度胜纬度”,疏通土地产权、国有非竞争行业、进出口关税、货币发行、银行信贷、资本流通等微观梗阻,南北自然流通,宏观自然畅通。

2021年,下面需要休养生息,上面需要大刀阔斧。

02、东食、西宿与失衡

微观与宏观的背离是经济秩序的失调,国内与国外的背离是政治秩序的失调。

这次疫情重创了经济全球化,暴露了全球化治理的失败。为什么当今的全球化秩序导致内外利益背离?

我们先来看一个寓言故事。

东汉学者应邵的《风俗通》记录:齐国有个年轻貌美的女子,东西两家的邻居同时上门求婚,东家公子有钱但相貌丑陋,西家公

子相貌英俊但是一个穷书生。姑娘父母很是为难,便询问女儿的意见。这位姑娘的回答是:“欲东家食,西家宿。”意思是,我两个都想嫁,白天在有钱的东家吃饭,晚上去西家跟帅哥睡觉。

这就是“东食西宿”的故事。应邵用这个故事嘲讽那些妄想两边通吃的贪婪之人。

如今苟延残喘的全球化旧秩序,就是一个“东食西宿”的贪婪制度。一群人,如跨国公司、金融资本、科技巨头、新移民者以及建制派,他们如齐国女子般“年轻貌美”,国内国外两边通吃。

拜登的支持者,如巴菲特、索罗斯、比尔盖茨、托马斯斯泰尔、史蒂文斯皮尔伯格、巴里迪勒、杰夫斯科尔、乔恩格雷都是跨国公司或金融界的大佬,他们享受了建制派超发美元的红利,然后利用这些美元在海外市场上扩张。在海外市场中,他们享尽海外市场的人口、资源、法律、环境、信贷及行政垄断红利,同时还在全球有效避税。比如,跨国汽车集团在新兴市场投资设厂,受到当地高关税和行政垄断的保护,在新兴市场攫取行政垄断利润。

反过来,齐国那些条件差的女子,如本土企业、工人、中产阶级,受到国家制度的约束,没有能力走出去,被那些走上国际的美貌女子“欺负”。跨国公司在海外享受的特权,打击了本土的企业及工人,导致工厂破产、工人失业。富豪可以在全球避税,公共开支最终转嫁到本土企业及中产阶级身上。

全球早已被“东食西宿”的秩序主宰,只是不同国家的“东食”与“西宿”有所差异。

比如泰国。泰王与军方默契“东食”——国王权威,操纵政治,《褻渎王室法》护体以及430亿美元的王室资产,同时他们又“西宿”——与国际资本合作,享受技术转移和旅游服务红利。新泰王哇集拉隆功长居德国,组建了20人豪华后宫团,荒淫无度,真正做到“东食西宿”。

又如沙特。沙特的“东食西宿”更加简单粗暴。沙特政府从美国标准石油公司手上购买了阿美石油,沙特王室通过控制政府而“东食”石油垄断租金。在西边,沙特王室与美国建制派睡到了一张床上。美国给沙特王室提供统治工具,第一次海湾战争时期,老布什派了几十万美军进驻沙特。沙特王室以美元结汇支撑美元,并将石油出口积累的巨额外汇购入美债及金融资产。

苏联解体后,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第一时间指出“历史的终结”。在他看来,自由民主成为了国家与全球化的标准模板。但是,此后30年,全球化的演进与福山的预期背道而驰。当恐怖分子袭击美国时,他的老师亨廷顿的“文明的冲突”更受认可。

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比亨廷顿、福山更加睿智,他用“集体行动的逻辑”解释这种问题。在一个国家的时间长河里,亦或是全球化的历史长河中,各种利益团体逐渐兴起,他们以集体行动的方式干预政治,借公权力谋求团体利益,并从中分得一杯羹。如今,他们成功了,在“东食西宿”的猎食者中,有国王、建制派、华尔街、跨国公司、科技巨头,还有福利主义者。

其实,这三十年既不是历史的终结,也不是文明的冲突,而是文明的终结——全球化既得势力与失意者之间的冲突。冷战结束后,国家之间的对峙与冲突大幅缓解。当“齐国”的敌人消失了,“丑陋的女人”沦为新的“敌人”。全球建制派开始构建一个“东食西宿”的全球化秩序。

过去30年的全球化是令人失望的世界。除了韩国,没有一个新兴国家完成了“历史性跨越”,没有一个国家迎来了千年大变局。韩国的“格林威治”在1988年。那一年,苏联还没倒台,美国顺势而为,韩国军政府倒台了。

九十年代兴起的互联网曾经带来无限期待。这位屠龙少年,不可一世,敢于斩杀一切权力的恶龙。然而,今天我们却发现,屠龙少年已经变成那条恶龙。微软、谷歌、Facebook、Twitter等创始人及背后的金融财团是建制派的拥趸,他们是“东食西宿”的顶级猎食者。

九十年代,还有很多西方学者和官员相信福山的“历史的终极”。新兴国家的既得势力也颇为担忧,或亦步亦趋,或胆战心惊地参与全球化。如今,已经很少西方学者和官员关心这个问题了,试图掩盖这个问题。为了避免吃相太难看,建制派之间会展现一

副苦大仇深、怒目相视的政治姿态。

结合上一部分的系统理论,如果把全球化看成是一个大系统,那么系统内部已被既得势力设置了无数微观梗阻。一方面,过去三十年,几乎所有国家都更加开放,经济更加繁荣,新兴国家成为了制造中心。但是,这部分被夸大了,因为全球化带来的财富与自由只被一部分人占有。另一方面,一个个微观梗阻扼住了一些国家走向文明的咽喉。

“东食西宿”的背后是一个个微观梗阻制造的全球特权联合体。这个联合体将很多新兴国家演变为半全球化国家,甚至是半封建国家。建制派的政治势力、华尔街的金融资本的介入,更加强了新兴国家的这种畸形的稳定性。

2008年,这个梗阻癌变,这个失衡的秩序崩溃了。2015年,特朗普上台后粗暴地扯下了奥巴马竭力掩饰的政治面纱。2021年,美国拜登的主要任务是继承奥巴马的政治遗产,即维护这个“东食西宿”的全球化旧秩序。

接下来如果继续维持这种秩序,新兴国家很难晋升到发达国家层面。在《国运2020》中,我指出中国正在临近“历史性的跨越”。但是,2021年拜登上台,继续维持旧秩序,当然会阻碍中国的这一历史进程。新兴国家,包括中国,需要对这一旧秩序发起挑战。

一个国家,需要从自己的历史中抽离出不可动摇的“抽象逻辑”,以避免时间上的背离,避免新人与老人之间的思想冲突。

2020年《大秦赋》的播出,引发了激烈的争论。这是一场关于历史观的争论。如何评价历史?如今的时代,盖棺定论显然是罩不住了,新一代的人试图打开棺材板重新审视历史,重新评价秦王和秦统一六国。

历史观的问题,会一直争论下去,但共识是什么?一个国家的民众,一代一代繁衍,新的移民者加入,他们对国家的历史共识是什么?那就是这个国家在历史长河中抽离出来的“抽象逻辑”。

比如,秦王统一六国。你可以问:这是谁的国家?秦王与民众什么关系?秦王统一的国家与今天的你什么关系?我们需要通过抽象逻辑,即是否符合自然规律和人的行为规律,来审视一切历史,评价王侯将相的一切行为。这就是历史观。

如今中文互联网上几乎每一个话题都争论不休,除了瑜伽版块。为什么瑜伽版块很和谐?因为符合抽象逻辑——荷尔蒙的分泌规律是一致的。

文艺复兴开启了人类的思想市场。复兴什么?古罗马的人文精神,就是将人从宗教控制中解放出来。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作品,如雕塑、绘画、音乐、文学,很多都是歌颂身体美、性解放和爱情自由。为什么?这符合生理规律和心理规律,容易引发共鸣,自我觉醒。

如今,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40多年,未来怎么走?怎么看待过去,就是怎么看待未来。那么,过去我们做对了什么——做了哪些符合规律、符合抽象逻辑的事情?

跳出计划,发展自由市场。亚当斯密的市场学说论证了这一抽象逻辑。这事我们做对了。但是,如今有人提出可以让私人经济退出。接下来,我们需要更大力度地支持自由市场,创造交易费用更低的、政策更加稳定的营商环境,鼓励企业家创新。

对外开放,融入国际市场。李嘉图、俄林的国际贸易学说论证了这一抽象逻辑。这事我们做对了。但是,如今全球化秩序沦为“东食西宿”,经常项目严重失衡。这时我们怎么办?我们需要继续扩大开放,反对这种失衡秩序,开展更加公平的更加深入的惠及大多数人的国际贸易。

产权改革,激活土地市场。穆勒、科斯、阿尔钦的产权理论论证了这一抽象逻辑。这事我们做对了。但是,只做了一半。张五常式改革只将土地使用权拿出来交易,在当时它是有卡尔多-希克斯效率的。如今,效率下降,风险大增。土地改革到中途,产权无法交易,制约了土地供给,扭曲了土地价格,城市房地产泡沫膨胀,市民负债率攀升,农村土地资产“沉睡”,农民增收遇瓶颈。正如第一部分所说,土地产权这个微观梗阻已经影响到整个系统的效率。所以,土地还需沿着抽象逻辑的方向继续改革。卡尔多-希克斯效率只是过程,改革的目的是帕累托最优。